

凡人与伟人之间

在开拓中奋进的秦人

杨作云 王世荣 主编
延艺云 李晓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者题记

陕西自古人杰地灵，历代名人辈出。如今，在三秦大地上，无数的精英人物，为了振兴陕西、繁荣陕西，使陕西走向世界，在各条战线上，正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是陕西的现在，也代表着陕西的未来。讴歌这些人物，激励广大青少年，加倍努力，继往开来，去创造更加灿烂的科学文化，这是宣传陕西、树立陕西形象的一个光荣使命，具有着深远的意义。本着这一主旨，编辑这么一套书，这是我们为宣传陕西和陕西人所作的一点点努力，同时也以此表达我们对这些精英人物的崇敬之情。

群星荟萃，光华璀璨。改革开放的浪潮滚滚向前，这里收获的，仅仅是几朵浪花。入选本书的条件，是在各条战线上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不论年龄大小和地位高低，不论资排辈，全方位、多视角地反映群英的风采，显示时代的风貌。由于组稿和篇幅诸方面的因素，本集以社会科学和企业界为主，其中又不免挂一漏万，一些著名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很可能尚未收录，这就有待于以后结集再出。

我们设想，第二集将以反映科技战线为主，首先介绍和反映在陕西作出卓越贡献的学术带头人和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欢迎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把自己身边的优秀人物和先进事迹，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提供给我们，共同为编好这套书而努力。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本集在组稿过程中，得到省内外许多陕西人和社会各界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踊跃供稿，在此一并表示诚意！我们特别感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积极合作，感谢傅美琳同志为此付出的巨大劳动。

我们热忱希望大家继续赐稿，来稿请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延芸云或宝鸡师范学院中文系杨作云。

目 次

勤奋是幸福之泉

- 记张岂之教授……………徐怀东（1）

锲而不舍 劳而后获

- 谈史念海先生的治学……………上官鸿南（13）

浩气由来塞天地 高标那许混风尘

- 霍松林先生学术传略……………尚永亮（26）

勤奋犹如美酒

- 记著名历史学家彭树智教授……………延艺云（43）

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西北王”……………徐怀东、邹东涛（56）

在风雨泥泞中跋涉的人

- 记著名文艺理论家王愚……………郭宝善（64）

燃烧的激情

- 阎纲和他的文学评论……………王世荣（81）

八荒一家

- 中国当代书画怪杰吴三大……………李桦（91）

黄河西来决昆仑

- 何西来自传……………何西来（117）

戴奖章的总编

- 记出版家赵喜民……………张继芳等（125）

引凤高飞

- 记陕西省西凤酒厂厂长何长庚……………徐少华（134）

点石成金

- 记农民企业家郭裕泉……………理直（141）

一片冰心在玉壶

- 记陕西太白酒厂厂长张景鹏……………闻言（151）

黑马奋蹄

- 记宝鸡市高佳农工商公司经理高来成……………祁念曾（168）

太白积雪六月天

- 吕芳亭和“太白集体农庄”……………李晓峰（181）

奋斗者的足迹

- 记农民发明家林纪功……………王世荣（198）

艺谋谋艺……………许劲文（207）

黄土地上的足迹

- 记青年学者魏杰博士……………李梦超（222）

记者的敏锐 理论家的深沉

- 肖云儒文学评论述描……………冯肖华（237）

从文学编辑到青年评论家

- 白桦其人其文漫说……………李西建（245）

特别学者

- 他是李水海……………张孔明（258）

军人·诗人

- 记著名青年诗人马安信……………唐廷华等（266）

郁郁桥山一棵草

- 记黄帝陵整修办主任何炳武……………吉友（274）

洒向人间都是爱……………梁虹（287）

后记……………（295）

勤奋是幸福之泉

记张岂之教授

夜幕降临，在全国重点大学西北大学的教学区一角，灯火通明。教学七楼一层阶梯教室坐满听众，连窗外也吸引了许多背着沉甸甸书包的男女大学生。此时，站在讲台上宣讲的是一位身材瘦长、风度潇洒的学者。他就是海内外知名的国家级有贡献的专家、中国思想史研究博士导师、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教授。

多年来，张岂之教授义务给全校师生开设系列讲座，已成为他生活的重要内容和习惯。今天宣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他针对一些人的“食洋不化”，指出：

“四个现代化的目的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民族性格，就需要研究长期影响过我国历史的儒学思想。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体。从绝对性因素方面说，它所揭示的一些真理粒子并不会消失，而后人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前进与发展。至于儒学中与现代生活观念和观念相抵触的君臣等级封建主义思想观点，也要作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懂得前人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走过不少弯路，作出过错误的论断，有助于我们更加有力地去剔除它们。”接着，先生列举大量例子，在国内学术界首次从“人学”、“自然”之学、“有对”之学和“会通”之学的哲理思维高度，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作了精辟的理论概括。先生提高嗓门，用这样一段话，作为讲座的结束语：

“我国是一个有11亿多人口的大国，需要强大的精神凝聚力，需

要大力宣传爱国主义。这些都要依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统既包括古，也包括今）中的精华相结合。只有这样，民族的凝聚力才有‘根’；只有这样，爱国主义才有深厚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做人的道理，关于积极探究自然的精神，关于全面分析问题的方法，关于广泛研究吸收各种学问的气度，都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继承。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研究，这里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任务，我们有责任将它担当起来！”

听众又一次被先生如此深邃的理论洞察力和敏锐地把握现实思想脉搏的本领折服了，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打心眼里敬佩这位当代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40年笔耕不辍

张岂之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时代，就着力培养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很受老一辈著名学者张岱年、贺麟等的赞赏。继之，考入当时的清华大学文学院，攻读研究生。祖国一解放，他就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从北京来到百废待举的西安，在西北大学任教。那时，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教育家侯外庐先生任西北大学校长。侯老慧眼识英才，看中了张岂之青年时代初露的才华，亲自选定张岂之作他学术研究的主要助手。从此以后，张岂之就和侯外庐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结下终生不解之缘。1954年，侯老奉命调回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任副所长（所长为郭沫若先生兼），张岂之随之也就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西安——北京往返的颠簸，因为他的身份、户籍关系和家都在西大。70年代末，侯老患病，后来卧床，直至1987年病逝，他都得暇便必探望，经常侍奉在身旁和病榻前，并承担起先生研究及组织科研的主要工作。侯外庐是国内公认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大学派，张岂之则通过

长期的科学研究实践，成为侯外庐学派的继承者和学术带头人。是侯外庐学派开创了中国思想史这个学科，张岂之则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中国思想史博士专业点的博士生导师。

50年代，张岂之协助侯外庐整理《中国思想通史》一、二、三卷的出版。1957年，侯老着手组织该书第四卷的写作，他参加了全部工作，并独立撰写了王守仁、王廷相等重要思想家章节。

《中国思想通史》是一部五卷六册洋洋300余万言的宏篇巨著，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思想发展历史的先河。在此期间及60年代，他还协助侯老写作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同理想》

（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一书，独立写作了《顾炎武》（中华书局出版）一书，并发表了《王船山的哲学思想》、《王船山的〈张子正蒙注〉》等多篇有影响的论文。70年代，张岂之受侯老的委托，具体负责《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思想史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书的编者工作。这两部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分别重印，并被一些高等学校作为教材。80年代初，张岂之又被侯老和邱汉生推荐为《宋明理学史》一书的主编。此书是国家“六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上下卷130万字，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宋明理学史》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198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全国著名专家张岱年、任继愈等12名教授和研究员在江西召开评审会议。会议认为：

“《宋明理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宋明理学的专著，在学术上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认为这部书“是一部拓荒之作，在治学方法上与《中国思想通史》一脉相承，充分体现并进一步完善了侯外庐学派实事求是的笃实学风与独立自得的开创精神，在理学研究上颇多突破。”80年代中期，张岂之担任了西北大学校长职务，但仍笔耕不辍。他合理安排时间，先后主编出版了属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一书；

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出版了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中国思想史》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近几年，张岂之教授又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潜心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研究，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儒家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孔子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精华例举及其效用》等系列论文，同时主编出版了《中国儒学思想史》一书。该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已决定要在今年组织全国专家对其价值进行评估。

积40年的潜心研究和精心写作，张岂之教授已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成为史学界颇具影响的知名专家。他的学术研究，具有开创性，反映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学科前沿的水平；他的著作和论文，反映了时代前进的脉搏，如为四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他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形成了自己注重翔实史料，擅长理性分析、善于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理论体系。鉴于张岂之教授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园地上取得了如此重大的科研成果，1989年，国家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同年，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学科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呕心沥血育英才

张岂之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大学的环境中，亲眼看着一茬茬青年学生跨入校门，吮吸知识的奶汁，学会建设的本领，走向祖国的天南地北、各行各业；又从各种信息渠道得知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在事业上有所贡献，他打心眼儿热爱自己所从事的教育职业，为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而感到欣慰，同时，也倍感肩上担子的重大。正如他在《中国教育报》发表的《探索学生思想工作的新路子》一文中所说：“近40年的教育实践和经历过的各种欢乐和痛苦，都使自己的心理状态真正成了一

个教育工作者的态度。从心态的情感因素说，不管遭受怎样的挫折，我总是热爱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我从心里喜欢青年学生们，祖国的四化要靠他们。唯其有这种深沉的爱，我才有动力孜孜不倦地从事我的教育工作，才有劲头去探索从事思想工作的新路子。唯其有这种爱，我才能在学校的管理以及维护校风校纪方面实行严的方针。唯其有这种爱，我才能看到学生们的长处，以及他们在思想上、心态上和道德上的短处，我才有做思想工作的感情立足点。我十分珍惜自己这种感情因素。”

凡是听过张岂之教授讲课的人，都对他渊博的知识、透彻的分析、清晰的条理、生动的表述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他治学与教风的扎实、严谨莫不叹服。这些特长，在他培养研究生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

张岂之教授培养研究生十分强调基本功训练。他强调研究生必须思路清晰，基本知识扎实，写作力强，要具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要经过严格的收集资料能力的锻炼和培养。他不仅对研究生的论文三番五次地提出修改意见，而且经常把他们的读书笔记和课堂笔记要来圈阅。一些研究生上学期间总想多发表文章，他就耐心地劝阻，并晓喻道：“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打基础，要尽可能地多涉猎知识，老老实实学，文章贵在质量，~~你发表~~发表一篇论文、出版一部著作，在学术界能有四五十人看就不错了。不要眼光太短，要尽最大努力把自己做学问的基础奠得宽厚些。”

一位名牌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慕名报考张岂之教授的研究生的，笔试成绩不错。面试时，他察觉这位考生古汉语功底欠佳。他认为，古汉语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门基础课，基础欠佳怎样研究学问。于是，他继续出古汉语方面的问题，考生闪烁其词，却寻机高谈哲学中的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张岂之顺势问道：

“那就请你谈谈存在主义哲学源于何人？”考生答不上来。张岂之耐心地向考生说明不能录取的原因，考生也心悦诚服地接受

了。

张岂之教授培养研究生，在学位授予上同样很严格，特别是自己带的研究生，更是如此。西北大学的一位讲师，曾是张岂之教授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他至今仍难忘怀导师当年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情形：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他当着邱汉生、李学勤等名流学者的面，心里有些紧张，因而答辩结果不很理想。尽管旁边的邱汉生、李学勤先生已示意：“能过去就让过去吧！”张岂之教授却毫不含糊地表示：“不能过关。”不怕别人议论，自愿给自己找麻烦，给这位研究生半年时间，让其修改论文，再举行一次答辩会。第二次答辩会上，这位研究生的观点更成熟了，答辩很成功，张岂之教授才满意地笑了。这件事对全校研究生教育作用很大。现在，这位已是讲师的教师，每逢谈起自己之所以能较快成长时，总忘不了那场失败的答辩会，不无感激地说：“幸亏有张先生的严格要求。”

张岂之教授培养优秀的研究生人才，可以说是达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有位研究生在平时言谈中，时不时地脱口冒出“我发现”这句话。在论文答辩时，张岂之教授很严肃地指出：“你发现了什么？”那位研究生才意识到“我发现”这句话的份量，当场脸红到脖根上。张岂之教授看他觉悟到了自己口语的失误，就语重心长地说：“‘我发现’这三个字在你可能是口头语，说顺口了，但我们是在搞学问。搞学问就得严谨，随随便便是万万要不得的。”

张岂之教授培养研究生，不只是教他们怎样做学问，更注意教他们怎样做人。每当社会上有不良倾向向学校袭来时，就被他敏锐地抓住，坚决地予以抵制。一个时期，社会上经商风盛行，学校当然不是“世外桃源”。张岂之教授发现有的研究生似乎坐不下来，经个别交谈，得知有些研究生觉得走“治学”之路“得不偿失”，这马上引起了他的警觉。那段时间，他连续给全校研究生作过几次报告，启发研究生要放眼未来，树雄心大志，

为祖国的振兴发奋学习。他还反复找自己的研究生谈心，帮助他们端正认识，静下心来，用功读书。

张岂之教授就是这样，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像辛勤的园丁，用自己的心血和劳作精心哺育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他的学生已是桃李满天下，英才遍神州，但仍未歇肩。他经常用这样一段话与同事们共勉：“出人才出成果，是国家交给西大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离祖国建设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给四化大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出色的行政管理才能

1978年，张岂之教授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1983年任副校长，1984年主持学校行政工作，1985年任校长。

高等学校的管理工作，对长期在业务岗位上口传笔耕的张岂之教授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许多问题过去从未遇到，从未考虑过。由于对管理工作的陌生，不能认识它的重要性，初做管理工作时，他的热情并不很高。

然而，张岂之教授在走上管理工作岗位以后，就不得不直接接触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学生管理、后勤服务等一系列具体事务，直接处理管理工作中的各种矛盾。过去在他作教师时感受到的教学与科研管理上的许多问题都摆到了面前，要他处理。这时，张岂之教授才逐渐对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在体制、管理制度和教学方法上存在的种种不适应四化建设要求的弊端有了直接的感受，对改革高校体制有了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

张岂之教授不同意长期以来在一些人中形成的这样一种观念：把管理和业务截然对立，以为管理就是处理一些日常杂务，不需要搞研究，而业务工作只是闭门读书，登台讲课。他认为，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不能只是一个学者，还必须是一个教育家，懂得管理学。而教学与科研的管理，是教育学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因之，管理工作不只是花时间就能作得好的。管理人员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一套科学的办法，对高等教育的性质、作用、机能和发展趋势有自己的看法和预测，对高等教育如何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有自己的见解。由此可见，业务水平是管理的基础，管理好坏又直接影响着业务水平，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对立又有统一。要紧的是找出二者相互联系的交叉点，才能处理好业务与管理的关系。

基于这样的认识，张岂之教授在管理工作中，大胆地起用了一批学有专长而又热心管理的教师到管理岗位任职；同时热情鼓励管理干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认真钻研各种业务，并亲自给他们上课，修改文稿。这样就调动了两种管理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管理队伍的素质。张岂之教授经常鼓励管理干部说：

“身为学校领导干部，如果能在高校管理和体制改革方面认真做些调查研究，切实解决一些问题，真正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所促进，这种贡献也许不亚于写一部学术著作，突破一项科研课题。”

张岂之教授是如此要求他的同事，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他在搞好业务的同时，把主要精力用在了西北大学的行政管理上，并通过实践，摸索出一套较为科学的工作方法。这就是，根据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妥善地作好管理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时间分配。在管理工作繁忙，要求专心致志处理某些主要问题时，便不能因学术研究而分心；但在管理工作不太紧张时，则可抽出一定时间搞业务。

在具体行政管理中，张岂之教授和全校师生员工一起，从西大的实际出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学校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为了解决西北大学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发挥老校潜力，多培养人才，张岂之教授主张冲破综合大学只培养单一本科生的办学模式，走自我武装、自我发展的道路，根据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培养人才。1984年，他受校党委委托，带领几位干部和教师赴京同石油部、石化总公司洽谈，签定委托办学协议，争取到基建投资2000万元，缓解了办学经费困难。1985年，一些系办班较多，他又及时提出加强宏观控制，确保教学质量、稳步发展的方针。

针对学校存在的考虑学科建设多、考虑经济建设和社会需求少的倾向，张岂之教授强调学科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明确提出西大为陕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的口号，并采取措施增设了陕西急需的新闻、文博、档案、行政管理和旅游经济等专业。

为提高教学质量，积极推动教学改革，张岂之教授与校长商量，制定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等一系列制度，使该校1985年考取研究生的比例达26%。另一方面为加强西大的科学研究，学校相继成立了现代物理研究所、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生物技术研究所以、数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为科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为解决西大基础设施差，欠帐多带来的困难，张岂之教授一方面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一方面抓校内基本设施建设。他和学校其他领导同志曾多次到国家教委、国家计委汇报情况，反映学校的困难；向省委、省政府汇报学校工作，请求省上把西大列为陕西建设的重点。在校内，他很重视抓好基建部门的工作，使校园面貌和基本建设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近两年，张岂之教授为解决联合办学中遇到的新情况，深化教学改革，他又积极倡导全校进行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涉及人事、后勤、学生管理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并报请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教委批准，使西北大学成为全国高校综合改革六个试

点单位之一。

张岂之教授作为校长，不单在西北大学的管理工作中，干出了出色的政绩；作为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省社联的工作也在团结社会科学界同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作为省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和省政协常委，他向决策部门提供了几份关于开发陕西旅游、文化资源的咨询报告和建议；作为学术界有威望的学者，他还先后在陕西主持召开了四次有关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并多次应邀出国讲学，扩大了陕西在国外的影响，传播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

勤奋是成功的源泉

大凡和张岂之教授接触过的人，都对他勤奋的程度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每逢节假和星期日，一般人都忙着走亲串友，或者稍事休息，可在张岂之教授看来，这是学术研究和考虑工作的黄金时间。五六十年代，西大马列教研室和历史系的教师，都了解张岂之教授有在节假日关起门来读书和从事写作的习惯，至于平时抓得紧，更是大家望之莫及的。这种特别珍惜时间的习惯数十年不间断，保持到70年代末。因为这时候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愈来愈多登门求教的人，使得他不能不有所改变。于是他就见缝插针地抓时间读书、写作、搞学问。现在，开会的间隙和外出的途中倒成了他做学问的黄金时间了。1989年12月，他赴京参加国家教委召开的部分高校负责人文科教改座谈会。开会间隙，他白天为学校跑事，晚上回到旅馆又审阅研究生的论文，写出修改意见。这两件事，他不但都认真做了，还在返回的途中，写出了即将出版的《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一书的“序”。

许多人说，张岂之教授的工作与学习达到了忘我的程度，这话一点不过分。在张岂之教授的心目中，家务事、个人事是没有多少位置的。他经常说：“工作那么多，我实在是顾不上！”一

次，家里人外出，他自己取油煎鸡蛋。油在锅中泛花，色泽不对；边做饭边想事，虽然看到了，大脑却没有空思考这是怎么回事。到吃的时候，总感觉不对劲，心中却埋怨起食物质量下降了。事后才知道自己用的是擦自行车的机油，弄得全家人哭笑不得。张岂之教授已是年过六旬的人了，但对饮食并不怎样讲究。整天没黑没明地干，身体照样挺得住。同志们经常看到，他在学校小卖部买几块点心，回到办公室倒杯开水，一餐饭就这样将就了。

让我们看一下张岂之教授去年春节是怎么度过的吧！初一上午，他主持召开学校团拜会（这种移风易俗、节约宝贵时间的形式，是他任校长后，在西大倡导并坚持下来的），并在会上宣讲了学校在90年代第一年打算做的事情；下午，他同西大其他负责同志接待陕西省省长一行来校慰问，并陪同省长看望了几位老教授；晚上在思想文化研究所看书。初二上午，与校长助理到省高教局拜年、汇报工作；下午与香港著名人士邵逸夫先生的代表马临博士长途通话，商定西北大学“逸夫图书馆”开馆典礼事宜；晚上，继续在所里看书。初三、初四、初五在办公室修改《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书稿。从初六开始，他的春节就过完了，上午召集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落实图书馆开馆典礼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和任务；下午，接待上海《文汇报》记者的采访……

张岂之教授曾在1990年8月26日新的学年即将开始时，给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的青年同志写过这么一封信。信中，他对青年人提出了勤读书、勤练字、勤练笔、要勤奋，内容十分具体的“四勤”要求，其中关于勤奋，他是这么说的：“勤奋——这是使人精力旺盛的源泉，勤奋——这是人的不老丹，勤奋——这是幸福之泉，勤奋——使人的头脑清楚、生活愉快。要不断地找事做，不要使自己闲着；不要让睡眠占太多的时间。这样，精神就会觉得充实，会使人聪明。要多做事，不只是做一件事，而是做许多事。无所事事，睡大觉——必然使人迟钝，精神萎靡。做事

要细，更要讲究效率；做一件事要有始有终，决不虎头蛇尾。当然，不是什么事都令人满意的。有的同志在工资、职称问题上心情不快。这要自己克制，不能让情绪干扰工作。首先要问自己是否全力把工作做好了。我相信，只要不断地把工作做好，个人的一些难题迟早会解决。同时要有这样的胸怀：我们工作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拿一个职称，或者仅仅是为了工资。我希望在这个大的人生观问题上，我们共勉。这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徐怀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出版社

锲而不舍，劳而后获

——谈史念海先生的治学

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在给史念海先生的论集《河山集·四集》所写的序言中说：“筱苏治历史地理之学已经历半个世纪以上。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近三四十年来，既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又能广泛利用考古文物方面的新发现与史料相印证。70年代起，更以花甲之年，对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淮河下游、太湖周围，作了十年以上有目的的深入而细致的实地考察。治学方法的突破前规……一变而为……用历史资料（包括文献与遗址遗物）与实地调查考察密切结合……，这就使中国历史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之重大，可不言而喻。”这段话蕴涵深刻，简明而确切地概括了史先生一生的治学。掩卷而思，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我是史念海先生的学生，大学读历史系，曾聆听史先生授课，获益良多。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追随史先生以治史。今天想起来，实在遗憾万分！最近数年，因为史先生年事日高，且兼职甚多，组织上要我协助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有幸接触多了起来。我生性愚钝又不谙专业，本不具备谈治学，尤其不具备谈史先生的治学的资格，只是由于多在史先生左右，耳濡目染，也约略能懂一些言谈。故对史先生学识的精深博大，治学的刻苦自励，成就的日新月异，且年事愈高而成果愈加丰硕，深感敬佩，也深为惊讶！窃以为此在学界，恐亦属难得。趁了这个机会，缘谭其骧先生的提示，从一个门外汉的角度，就我所见冒昧